

QIN LI YI LA KE ZHAN ZHENG

亲历伊拉克战争

迟浩田



新华社记者赵建伟战地纪行

新华出版社

1418126

亲历伊拉克战争

新华社记者赵建伟战地纪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伊拉克战争 / 赵建伟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9

ISBN 7-5011-6322-7

I. 亲… II. 赵… III. 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7034 号

亲历伊拉克战争

赵建伟 摄 /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6 开本 9 印张 2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322-7/E · 55 定价: 120.00 元

明知征途有艱險
越是艱險越向前

遲浩田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二日

贊趙建偉同志親臨伊拉克戰爭記實



赵建伟（中）与美军合影

序

亲历伊拉克战争的赵建伟

伊拉克战火硝烟未尽,《亲历伊拉克战争》摄影画册出版了。赵建伟的摄影报道,把我们带到了目光难以达到的伊拉克战场。阅读这本画册,对我们没能亲历伊拉克战争的人来说,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画册中的这些照片,展示的不仅仅是新闻,也不仅仅是艺术,透过新闻和艺术,我们看到中国摄影记者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

赵建伟作为新华社的一名摄影记者,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多次圆满完成了系列重大采访任务。他先后参加了香港澳门回归、98抗洪、国庆50周年庆典、神州一号飞船和火箭发射等重大活动的采访。

亲历伊拉克战争,使赵建伟成为当之无愧的战地记者。在美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前,他就积极向新华社提交了战地采访的申请,并得到批准。4月1日,他先赴土耳其,后经约旦进入伊拉克。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但为及时、真实、准确地报道战事,

他天天都去街上“逛”,哪里有枪声他就去哪里拍照,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常常在美军枪口下拍摄。在《美军士兵遭遇手榴弹袭击》的采访中,赵建伟在事发3分钟赶到爆炸现场,面对美军士兵枪口多次的阻止,在没穿防弹衣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采访。这组图片无论在时效上还是瞬间上都是少有的佳作。这条独家新闻被国内90多家报纸刊用,同时也被外国通讯社转发。在历时111天的采访中,赵建伟共发稿近1000幅,真实、准确、及时地报道了伊拉克战事,圆满地完成了战地报道任务。

《亲历伊拉克战争》摄影画册,在赵建伟的摄影采访生涯中,又增加了精彩的一页。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邵华

2003年8月于北京

南眺伊拉克

——土伊边境的战地生涯

4月1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朋友面色凝重地把我们送到国际港检票口，我忽然有一种壮士诀别的感觉。望着候机厅里匆匆过往的行人，大概没有谁会注意到，今晚有两个人将要离开这繁华的都市，随腾空而起的飞机，穿越环护着这座城市上空的云层，走向他们目光难以达到的伊拉克战场。因此，我激动不已，似乎生命中注定了要有这样一次庄严的出征。23点55分，我们登上了飞往安卡拉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离开了北京。4月2日清晨，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造访土耳其的这一天，我和文字记者马建国到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武装到了牙齿”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第一批赴伊拉克及周边国家的记者先后出发，要求上前线参加战争报道的“请战”热潮，在北京新华社的办公大楼里也不断升温。

我也是请战者中的一员。

3月28日，我接到了开赴土耳其增援伊拉克报道的任务。接到消息，我兴奋不已，因为早在战前我就提出要求参加战事报道的申请。但等到一切手续都办齐时，美军已于几天前决定放弃从土耳其开辟“北方战线”的计划。所幸的是，美英联军向巴格达推进受阻，美国又在利用空降部队在离土耳其边界不远的伊拉克北部地区部署力量，眼看要溜走的战地新闻采访机会又回来了。

在准备奔赴土耳其的几天里，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却早已飞到了前线。为了了解伊拉克的战事，我连续几天都没有离开电视。美伊开战的前几天，我几乎寸步不离电



出征前在新华社门前留念

视机，一日三餐都是方便面和野战食品，每天都要等凌晨两点多香港的凤凰卫视新闻报道结束后才睡觉。遇有急事外出，我也是随身携带一个袖珍收音机，戴上耳机，一直关注着伊拉克的战事情况。

其实，我在接到总社的通知前，就开始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还详细地列了一个清单：5台相机，其中2台佳能EOS1D的专业数码相机，3台傻瓜机，另外1台胶片机；17—35mm、35—350mm、100—400mm镜头及2倍接圈；便携式笔记本电脑2台，其中一台是我自己花了一万多块钱购置的；发稿用的海事卫星一部、手机3个；为保障以上电器的正常使用，我特地购买了一部车载充电器；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还提供了新型防弹背心、头盔、野战压缩干粮和方便食品等；装备部门给解决了防毒面具、防毒套服等防护用品；朋友还特地从广州捎来两个电子驱蚊器。万事俱备，为了完成这次艰巨的报道任务，可以说我“武装到了牙齿”。

抵达“前线”

4月1日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来送行的有我的同事和领导，但没有我的亲人，她们因工作外出没能赶回来为我送行，但在飞机即将腾空而起的前夕，夫人从远方打来了电话：我和女儿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你前方的消息，你每按动一下照相机的快门都有我们对你的一声问候。在她平静的语调中，更加坚定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带着领导的信任和亲人的嘱托，23点55分，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爬上了北京的夜空。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伊斯坦布尔降落。我们将稍做停留，转飞安卡拉。在转机的间歇，我在机场的小卖部浏览了一下当地的报纸——《土耳其每日新闻报》。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很显眼，约占四分之一的版面：一名头戴黑纱的伊拉克妇女满脸无奈地抱着孩子逃难，身后是浓浓的黑烟和美国的坦克车；照片上的黑体英文字写着：伊拉克战争中平民遭难。照片右边刊登了一条消息：“鲍威尔到安卡拉试水”。文章说，鲍威尔到土耳其与其说是为了寻求什么具体的合作，不如说是进行试探性的接触。看到这条消息，我的搭档新闻敏感很强的马建国立即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根据报纸上透露

的情况编发新闻稿件，我则用数码相机记录了他工作的情景，并以《新华社增派海湾记者顺利抵达土耳其》为题，就地用手机连接便携式电脑将图片发回北京。发完稿，我们又匆匆乘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航班，经过50多分钟的飞行到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也就是在4月2日，星期三，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到安卡拉造访的第二天。

安卡拉的地形多少有些像我国的山城重庆，房屋和街道都是依山而建。为了尽快赶到新华社驻安卡拉分社，从机场出来，我们没有经过繁华的街区，而是在陡峭的公路上蜿蜒曲折地跑了大约20多分钟，来到了位于安卡拉使馆区的新华社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怀成波给我们安排在中国使馆商务处住下。此时，商务处住着许多伊拉克战争后蜂拥而至的中国记者，我的隔壁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顾玉龙。

安卡拉似乎很平静，但是一些政府的建筑前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在路过以色列使馆时，气氛似乎更加紧张一些，楼顶和门口都有士兵，连使馆门口的街道都被封住了，这时我开始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抵达前线投入工作

“偷袭”“爱国者”导弹

4月5日，是我们到达土耳其采访的第二天。一大早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一些美国军队正在从土耳其东南部的马尔丁省向英吉利克空军基地调动。我和其他三名记者顾不上吃早餐，每人拿上一瓶矿泉水，带上压缩饼干，奔赴采访目标，开始了战地采访。

基地的正门是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军人守卫，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尽管我事先已准备好了相机，但也没敢举机拍摄。在这里我初感战地新闻摄影记者的危险性。先期到达土耳其的摄影记者刘宇担任司机，他对这里已经是人地两熟，不到20分钟就领着我们迂回到基地正门附近的乡村小道上，汽车在麦田和沟渠之间的小道上蜿蜒慢行，车南侧大约80米的地方就是用铁丝网围成的美国空军基地。

放眼望去，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些身穿汗衫的小伙子在打高尔夫球，他们是驻扎在这个基地的美国士兵。这天是周六，虽然是在战争的后方基地，但这些美国兵仍没有忘记休闲。一边是高尔夫球场上悠闲自在的美国士兵，而另一边则是一排整齐的导弹发射车，那就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基地。一排像多管火箭炮车一样的军车在远处一字排开。

这个美军基地早就部署了“爱国者”导弹，只是因为防卫严密，记者很少能够看到它们的“真面容”。与我同行的文字记者郑金发和摄影记者刘宇早在十多天前就曾试图拍下这里的军事设施，但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看来这次我们是如愿以偿了。

基地被铁丝网包围着，岗楼上的土耳其士兵看到了我们，但似乎很友好，老远还冲着我们招手。老郑说，这些土耳其士兵肯定以为我们是“误入歧途”，走进了乡间小道。没想到我们使用的现代高科技“武器”——佳能1D数码相机，用100—400变焦镜头加2倍接圈，也有一定的“精确制导”能力，在汽车行进中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爱国者”拍摄了下来。就连肉眼看不清楚的正在空中飞行的战机也同“爱国者”一起收进了我的镜头。



- 部署在空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
- 几名美军士兵在空军基地打高尔夫球
- 待命的美军空中加油飞机





“拦截”美军车队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经常有美军车队出现，但又不知道车队何时出发。为了拍摄这一情况，我们出发前临时制定了一个计划，从我们当时所在的阿达纳市旅馆直奔市郊的因吉尔利克美国空军基地。因为从土耳其东南部的马尔丁美军后勤基地到南部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公路只有一条，只要我们不下公路，这样一路“拦截”，我们的拍摄才可能是万无一失的。

向导仍是摄影记者刘宇，（因为我的接替，刘宇已经宣布“封镜”，自己给自己定位是专职司机），我则坐在副驾驶的部位上架起了35—350mm的变焦镜头的数码相机随时准备“咔嚓”；后座的两位文字记者一个负责观察细节，准备执笔“敲”稿子，另一位则在观察动向的同时，随时准备利用会讲土耳其语的优势进行采访和“交涉”。

四双眼睛瞪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美军车队的影子，当我们开始感到疲倦，正要打瞌睡时，突然刘宇喊道，“老赵，注意！有动静！”还没等话音落下，对面驶来的两辆载着军用吉普车的货车呼啸而过。

“糟了，没拍好！”这时我遗憾得脑门上都出了汗。

“别急，大部队还在后面，有的是让你拍的”。老郑心中似乎很有数。果然，又往前开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冲着刘宇说，“停车！这回可让我老赵赶上了！”“好大的阵

一批美国军用装备撤离土耳其

势啊！”，本来已封镜的刘宇好像也按捺不住了。

对面的一个路边公路快餐店的停车场上，乱七八糟地停了足足有20多辆拖车，车上有军用吉普车、油罐车、装甲运兵车还有些用帆布盖着的装备。

因为担心车队周围站岗的军人阻止拍照，所以我在车里就没有动，只是“咔嚓、咔嚓”的按快门。这还不满足，我和刘宇一合计将车头调回开到预计的制高点，可以将美军车队一览无遗地收入我们的镜头。但万万没想到美军很狡猾，我们还没到目的地就被美军追赶了上来，这时候我们只好将计就计，下车“拦截”。我们正在拍照时，一辆警车突然停了下来，用喇叭喊叫，他们荷枪实弹地跳下车，我们仔细一看是押运的土军，只好摆摆手，示意我们没拍照，土军看到我们身上的摄影背心印有中国国旗，知道是中国记者，才友好的让我们走了。“老土”刘宇一副久经沙场、毫不畏惧的样子，倒是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接班人”虚惊了一场。我们离开时才发现，原来跳下车来的土军士兵在修车，估计是遇到“敌人”的“袭击”来了个急刹车而造成的。

一路上，他们几位一直“表扬”我，说我一员福将，刚到土耳其南部边界就把“爱国者”导弹和美军车队等场面都收进了镜头。



- 一批美国军用装备在撤离土耳其的途中
- 美军存放于土耳其克泽尔泰面粉厂的军用装备全部撤离
- 一艘载有军车、“爱国者”导弹等军用物资的货船进入土耳其伊斯肯德伦港
- 一批军用物资进入土耳其伊斯肯德伦港

“闯”关

安卡拉，当地时间6日晚。经过近千里的狂奔，我们新华社一行四人终于抵达土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省，7日一大早，便在新闻中心领到了“战地采访证”。这是我们在土伊边境采访的敲门砖。

郑金发和刘宇已经在土耳其采访了近三个月，是名副其实的“老土”。为使我们能够尽快熟悉土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城市的路线和“人头”，他们带着我们这两位“接班人”，两天下来，跑了1800公里，足迹遍布了土伊边界小镇锡洛皮、因吉尔利克美国空军基地和伊斯肯德伦港口在内的近9个城镇。

为了节约时间，避免绕道窝工，我们4个人直接从位于土东南部的马尔丁美国后勤基地赶到土伊边界的小镇锡洛皮。但这300多公里的路程却让我们整整跑了5个小时，因为除了山区的公路路况不敢恭维之外，途经的近十个关卡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口舌，有时还甚至“心惊肉跳”。

锡洛皮是土伊边界土方一侧的最后一个小镇。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这里已经成了国际新闻战的“兵家必争之地”。其中中国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曾光顾这里。在这里，除了在安卡拉领取的记者证外，还必须有迪亚巴克尔领取“战地采访证”，否则的话，就寸步难行。

从马尔丁到锡洛皮的第一道关卡就“卡”了我们大约半个小时。一个看来像遗弃的路边店的破房子旁边停放着一辆墨绿色的装甲车，七八名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军人堵在设有红色塑料锥筒的路障的公路上。一个大约40岁的“长官”拿着我们的护照和证件看了半天，直摇头。尽管郑金发用土耳其语解释了十多分钟，那位长官还是“照章办事”，摇头说“不！”这时，我灵机一动，从摄像背心里摸出了一个小礼物——一个中国结做成的红色“福”字。这位军官拿到礼物仔细地看了看，友好的表示使这位长官改善了态度，答应打手机请示一下安卡拉的新闻局。



土耳其士兵在土伊边境执勤



在土伊边境执勤的土军装甲车

通过手机嘟噜了好一阵子，他伸出手，“好，祝你们好运！”天哪，开始我还真担心开了一个多小时车被堵回去呢，可真没想到，小礼物派上了大用场。也许是因为身上多了一个护身符，凡事畅通无阻。昨天刚办好了“战地采访证”，今天这次边界行也十分顺利。开着奔驰车在土伊边境游荡，到处寻找战地的信息，远在异国他乡的采访，我逐渐体验到“万事预则立”的好处，在食品紧张的时候，我们不仅有足够的压缩饼干，而且为这次工作专门在北



京购买的多功能的充电器也立了大功。这种充电器能够利用汽车上的点烟器为手机、电脑、相机、海事卫星电话等各种电器充电。我们在伊斯肯德伦港口、因吉尔利克美军“前线机场”、美军后勤基地的采访都是在行进中采写稿件，发送北京，没有这个充电器真不知道发稿要有多困难，因为土耳其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如果等找到一个有电源的地方发稿，国内的很多报刊的截稿时间恐怕都过去了。

土军装甲车在土伊边境的锡洛皮街头上巡逻



国际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伊拉克



运动中抓拍新闻

4月10日，我们开着新华社土耳其分社的那辆白色奔驰车又跑了300公里的路，傍晚，我们临时歇脚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交界处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早晨6点（北京时间11点）起床，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有关伊拉克的新闻，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巴勒斯坦宾馆被美军误击。声嘶力竭的呼救声，满面鲜血的记者、地板上沾满血迹的那架相机好像和我拿的佳能数码相机一样。又有三个记者倒在了伊拉克的战争中……。

吃早餐时我爱人从国内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看到巴格达记者遭炸的电视画面，我说，“看到了”，她说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一定注意安全。放下电话，快速地用餐。煮鸡蛋、干面包、地中海一带特有的酸咸橄榄、外加每个桌子上的一大瓶冰镇的矿泉水就是这个边界三星宾馆的早餐“盛宴”。因为还要往土耳其与伊拉克交界的小镇锡洛皮赶路，我往肚里送了两个鸡蛋，建议同行记者马建国也多吃，填饱肚子不想家啊。

因为昨天马建国写稿睡得较晚，我主动提出开车，要



发稿时引来了当地少年好奇的围观

他把副驾驶的位置放展，坐“卧铺”好好补上一觉。“糟了，重型坦克车过来了”。还没等他躺下，抓着方向盘的我就抱怨，“这辆奔驰不错，但失去了拍摄机会”。说话间，只见又一辆拉着重型坦克的拖车已经轰然过去。

看来，开车已经注定要成为马建国这次土耳其边界行的主业之一了，谁让你跟摄影记者搭档呢。真有些不好意思。“这样也好，你为我开车，我给你当秘书”，我开玩笑地说。无奈的马建国只好又当上了司机，我便在运动中抓拍了美军和土军的一些活动。

在距离锡洛皮还有30公里的一个山口，我们停下车来。只见苍翠的高山缓坡中夹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一群群绵羊在河边山坡上啃着刚刚冒出地面的嫩草，远处是戴着雪帽的群山和似雾似烟的云。“好一片云在山中游，山在云中浮的美景啊。”我惊叹道。摊开地图，我们发现，眼前的这条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的上游，这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望着眼前那叠嶂的高山和那灰暗的云雾让人感到了有些沉重。“山的那边大概就是战火中的伊拉克吧？”我感慨地说。

生日“历险”记

4月11日，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第23天。因为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边界小镇锡洛皮没有任何让记者们兴奋的“动静”，所以我们便请当地一位略懂英语的库尔德人当翻译兼向导顺着一条土耳其军队岗哨较少的小路驱车向伊拉克边界挺进。去的路上平安无事，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在距离土伊边界还有两公里

的地方将车停了下来，隔着铁丝网“亲近”了一下伊拉克。库尔德向导指着眼前的重重高山说，从山脚开始就是伊拉克的领土了。路边草地上是悠闲自在地啃着青草的羊群，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高山，远山近景十分美丽。因为土耳其向记者开放边界一直没有任何松动，也许这次只能这样看一下伊拉克了。因此我们想在此拍照留个纪念，谁知正在此时，麻烦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拦住了我们。凭借这几天的经验，我们以为值勤的哨兵大不了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战地采访证”了事。可我们的判断错了。库尔德向导刚才还在宽慰我们说，这里的兵都是他的朋友，但见他上前用土耳其语嘀咕一阵也没有效果。马建国也和士兵交涉，这个机会我也没有放过，我乘车往路边停靠的时机，偷偷举起相机透过车后挡风玻璃把土军士兵盘问马建国的情景收进了镜头。

经过交涉看来仍没有效果。无奈，我们只有在一名持枪士兵的“护卫”下，被请进了军营。只见一个满脸严肃的军官走来，他向旁边的小兵说了几句，然后指着一把椅子让我们坐下。令我们想不到的是，那位小兵竟然端来了几杯红茶。通过我们的库族向导知道我们是“秦”（土语“中国人”的意思），问我们是不是拍了照片，向导很聪明，一个劲地摇头，这时，不懂土语的我似乎也意识到哪位军官问的什么意思，我一个劲地摆手说“NO”。这时马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袖珍收音机送给了土军军官，从而



土耳其士兵在盘问中国记者

打破了僵局，开始拉起了家常，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经过一番周折，我们和土耳其军官握手“再见”，大大方方地从军营里走了出来。据说，这里对“违章”的记者处理是很严的，一般经严格审查2—3天才放行的，看来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忙乎了一天，快到晚饭时，夫人打来电话：“祝

你生日快乐”！这时我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在锡洛皮这个土耳其东南部边界小镇的街道上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生日蛋糕，在一家商店门口，马建国提议不吃蛋糕，改吃冰激凌蛋筒，反正今天也很热。我们两个中国“老外”就吃着蛋筒进了这个小镇的“豪华”饭店，是一家我们几乎每天都光顾的小饭馆。吃了好几天，今天才发现小饭馆还有一个长满青草的后院，院子大约只有40平米，草坪上放了一张桌子，倒也满有情调。没有啤酒，也没有蛋糕和长寿面，但看着挂在当空的明月和满天的星星，倒真感到惬意。白天的“历险”成了我们生日的话题。



领到“战地采访证”准备出发

“SARS”——在土耳其被“隔离”的日子里

5月9日，我奉命前往伊拉克采访。当晚9时许，在伊斯坦布尔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办理前往安曼的登机手续时，却因“SARS”被拒绝办理登机手续。这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在交涉中，工作人员还拿出一份约旦政府的文件说：以下国家和地区的人员不得入内，其中包括中国。我不解地拿出护照再三解释说：我已在土耳其工作了一个多月，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什么“SARS”之说。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解释之后，又与约旦方电话联系并说明情况，但仍被拒绝。无奈之下，我只好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报告了受阻的情况，使馆人员与约旦使馆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得到了答复：目前，持公务护照者也要进行查体，出具医院健康证明，经约旦政府同意后方可进入。我只好在次日乘车返回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回到住地，我将情况特向国内总社作了书面报告，总社很快发了专函，并请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按照程序协助办理有关手续。5月15日，中国大使馆正式照会约旦驻土耳其大使馆，经交涉，免去提供医院健康证明，但约旦方需要大约在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答复，我就这样被“隔离”了。

我是一名记者，没能参加祖国抗击非典的战斗，本身就有点遗憾，又无法及时赶到情况依然危急的伊拉克，心里是又着急又无奈。“隔离”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

由于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吃的都是烧烤的牛羊肉，很少吃到蔬菜和水果，偶尔吃一次从北京带来的“康师傅”方便面算是改善生活了。一次，在中餐厅就餐时，碰到了一位会说中国话的土耳其人，正好坐在了我的对面就餐。他说他在上海一家饭店当厨师，因

“SARS”回来休假了，刚下飞机到这里吃饭，并说见到我很高兴。他越说越高兴，我却越听越害怕，按说他才是应该被“隔离”的对象。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把饭吃完，不安地回到住所。这里一没消毒液，二没预防针，好在我随身带了板兰根，一次就喝了两袋。本来签证的事已经让我很烦了，要再让这位土耳其人给传染上“SARS”，那就真麻烦了。心里没底，马上给从医的夫人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很自信地说：你的身体那么结实，不会被传染上的，但自己要观察，只要不发烧、不咳嗽，就不要害怕，但这事要保密，如果向外说，那真的要把你给“隔离”起来了。听了夫人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很多。我打起精神到自选商场买了米面、羊肉、鸡蛋和蔬菜，回到住所关起门来，便开始了真正的“隔离”生活。家里没做过的家务在这里都做了，洗衣、做饭、采购样样都得做。每天除了看国外电视，还可以看到国内的CCTV4，也能上网看新闻等。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不但没有发烧，体重还长了几斤。

在“隔离”的日子里，我也没闲着，将在土耳其采访的全部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还向总社编发了《世界文化遗产——内姆鲁特山遗迹》和《土耳其石林教堂文化》等多组图片；还采访编发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炸弹爆炸》及《土耳其中国餐馆生意好转》等图片；还给国内媒体写了文章，并通过电脑整理了数千张数码照片。在国外被“隔离”的日子里，每天从新闻里都关注着国内的疫情变化，看到感染人数一天天逐渐减少，心理无比高兴。被“解禁”的日子快到了，我心早已飞到了伊拉克。